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三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〇二期 ——
(二〇〇二年八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08c)

【资料汇编】文革中的八月	唐 郎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十九）	周孜仁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资料汇编】

文革中的八月

• 唐 郎 •

◇ 一九六六年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出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74人，候补委员67人；另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师生的代表47人列席了会议。

8月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第一天会议上，刘少奇主要就“工作组”问题作了讲话。他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在讲话中强调了两点：一是工作组做了坏事，二是官做大了不要脱离群众。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回信（见本刊zk9609a），并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见本刊zk9603a），作为会议文件。

8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

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情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肃处理。”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要求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他的这段讲话，全会议程为之改变。

8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等参加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宣布为受迫害的革命群众平反，坚决支持广大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周恩来讲见本刊 z k 0 2 0 8 a）。同日，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了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大会，号召师生员工团结起来，彻底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见本刊 z k 9 6 0 5 b）。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是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

8月7日，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这张大字报和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

8月6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向社会散发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该《呼吁书》说：最近，中学文化革命出现了一系列极端严重的错误事件。一小撮坏蛋和披着革命左派组织外衣的人，打着造反的旗号，抗拒毛主席指示，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到处殴打人，捣毁机关学校，进行流氓活动，进行反革命政治活动，严重破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革命左派的威信，破坏党和毛主席的威信。“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禁止乱打人，要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我们工农革干子弟，决不能去损害党的生命，要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之一，因其共分十六条，故又把它简称为“十六条”（见本刊 z k 9 6 0 8 a）。

8月1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十六条》公布的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响亮的口号。

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说：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份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些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了？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会议公报，说：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搞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全国人民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8月13日，林彪在为贯彻刚结束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而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其内容共分两部份：一是文化革命问题，二是军队的干部问题。林彪说：对文化大革命“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这是破旧立新的重大的战略措施”。“我们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我们根据主席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了三条办法，主席同意了。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一个全面的调整。”“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照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8月16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兵团在省委院内贴出“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的大字报。下午，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回到哈尔滨，主持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决定采取高姿态，把问题拿到群众中去辩论，发动群众进一步批判省委错误，并发布了“关于开展‘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辩论的通知”（即八·一六通知）。8月18日，在哈

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大会上，潘复生态支持学生炮打省委这个司令部，并带上红卫兵袖章参加游行，成为全国第一位支持红卫兵造反的省委第一书记。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8月19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表示支持郑州大学少数派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造反行动。

8月20日，北京“红卫兵”走向街头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四旧”。此后，“破四旧”的浪潮迅疾席卷全国。

8月21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规定：一、所有部队绝对不准动用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更不得向学生开枪，就是向学生放空枪，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将要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二、如地方党政机关邀请部队参加庆祝集会时，经大军区党委批准，可派少量部队参加，但一律不准携带武器。三、在任何情况下地方党政机关要求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军委批准。四、学生与学生或学生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军队不要介入。五、部队不得派军队进入工厂、学校去搞宣传劝说活动。六、军队不得给地方学校、工厂、机关贴大字报，地方学校、工厂、机关给部队贴大字报时应表示热烈欢迎。七、任何逃避斗争，跑到军队躲藏的人，军队要他们回去，不得隐藏他们。

8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规定如下：一、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二、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胁也绝对不允许。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五、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前者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有的地方，有少数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受了蒙蔽和欺骗，参加了对革命学生的斗争。用这种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作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政策的。《好得很！》说：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这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是大快人心的喜事。社论欢呼：“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

8月23日，著名作家老舍因受到“红卫兵”的批斗，不堪屈辱，愤然投湖自尽。去世时67岁。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运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大会，把凶手捉回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发生法西斯式的残杀无辜者事件。8月下旬，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派出所的民警闻风而动，他们向红卫兵提供了管辖区域内“四类分子”的情况，并以这些“四类分子”的“不法行为”来激励红卫兵对他们的仇恨。8月27日，有红卫兵将个别所谓“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揪出来斗打。把人打死后，红卫兵还觉得没有搜查到对方的“变天帐”，于是又把目光投到其他“四类分子”以及一些有问题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身上，有的还拍电报、写信催促在外工作的家属立即返回，以便满门抄斩。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共有325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遭到残杀，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出生38天，有22户被杀绝。另外：从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时间里，北京市共有1700多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有8.5万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赶出北京。此外，在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市共有11.4万多户被红卫兵抄家，或被迫闻风主动交出各种财物。仅西城区福绥境一个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图书字画等被焚烧了8天8夜，大量文物被毁。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共50万人。林彪在大会上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讲话，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旧四’。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面貌。”“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领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话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份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从此，红卫兵大串联开始。

◇ 一九六七年

8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社论说：“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这篇社论是由王力、关锋、林杰起草，陈伯达签发。社论发表后，社会上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8月12日，毛泽东批示这篇社论是“大毒草”，要“还我长城”。并由此直接导致了王力和关锋的下台。

8月3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发表社论：《打倒带枪的刘邓》。社论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在一起，串通一气，篡夺无产阶级对军队的领导权。一旦他们阴谋得逞，就不会停留在‘软刀子割头’，而是重走‘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老路，枪杀革命的人们。”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带枪的刘邓！”

8月4日，上海柴油机厂发生严重武斗事件。这次事件发生的时间之所以定在这天，是为了赶在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周年前。

8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分别在中南海受到批斗；同时，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的批斗大会。批斗结束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8月7日，刘给毛泽东写信，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并书面向毛泽东提出辞呈，并向毛泽东写明：“我已失去自由。”

8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一年前写的《炮打司令部》，并发表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社论说：这张大字报“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豁然开朗了。原来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存在着两个根本对抗的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如果不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可能死灰复燃，还可能利用他们政治思想上的影响继续毒害人民群众，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现在，这些顽固的阶级敌人不是还在负隅顽抗，疯狂反扑吗？因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就是给资产阶级司令部最彻底、最致命的摧毁。”

8月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全面否定建国17年来公检法的工作。谢富治说：“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今年一月风暴以前，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那么多的公安机关为什么老是支持保守派不支持造反派？这个根源，要归到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特别是彭、罗。整个17年来的公安工作，当然不能说所有事情都没有按照毛主席思想办，但相当多的是没有按照毛主席思想办的。”“现在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你推翻一层，搞一个勤务组，还是一样。”谢的讲话，导致了后来“砸烂公检法”的发生。

8月7日，王力在接见外交部造反联络站时讲话说：“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部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搞外交？”“你们一月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看来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造反派也不是所有老年人都不要嘛！路线、方针、政策，中央、主席决定，至于怎么贯彻执行，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什么形式大家创造。”这就是著名的“王八七讲话”，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红卫兵造反派对外交部的夺权，以及8月22日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的发生，成为王力下台的直接原因。

8月9日，林彪在接见武汉军区曾思玉、刘丰时指出：要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垮台，办法有三条：第一，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第二，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第三，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坚决站在毛主席、站在左派一边。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的要点是：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主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2月3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二、中央已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

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三、各群众组织应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四、无论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支，抢劫军火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决定》的主要内容有：一、江西省军区及部份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在南昌，军分区某些人给保守派（联络总站）发了大批枪弹，打死打伤了大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在赣州，军分区个别领导人支持了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了武装镇压。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为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军区政委，杨栋梁为江西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军区吴瑞山等，应对所犯错误作认真的检查。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陆续进驻江西各地。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支持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要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三、中央决定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四、斗争的大方向是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对准省内方志纯等走资派。

8月1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党内文件《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发表时，删去了原决议中“同志”这一称呼。同时，《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分别发表了《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社论。

8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为了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彻底肃清他们的影响和流毒，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需要在中央报刊和地方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一些中央部门、中央局和省、市委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通知》提出：一、已在中央报刊上点名批判的有彭真、彭德怀等7人，已在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的有陶铸、王任重、李井泉、乌兰夫等14人。“对于这些已点名批判的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央报刊或地方报刊上还要深入地进行批判。”二、在中央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薄一波、吕正操、张闻天、张劲夫等10人。三、在地方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习仲勋、陈丕显等24人。

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决定撤消王鹤寿、赵敏、罗定枫、钟剑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对王鹤寿实行隔离反省。支持“鞍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部”等组织，号召“钢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等组织中的广大群众“坚决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决定》要求各派组织遵守“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并决定对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实行全面军事管制。

8月22日，红卫兵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自3月份以来，中英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8月20日，针对港英当局对香港三家报纸作出的停刊令，外交部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停刊令，释放被捕的新闻工作者和撤销对报纸及印刷公司的诉讼。在英国政府拒绝这些要求后，北京市红卫兵和群众1万多人于22日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在进行抗议的过程中，又冲入并放火烧毁了代办处。次日，《人民日报》以《首都红卫兵对英国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报导并肯定了这一事件。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等接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小组和进驻外交部的群众组织的代表，对这一事件提出了严厉批评。随后，中国政府向英方道歉，并为英国驻华代办处重盖了房屋。

8月23日，解放军报社肖力（即毛泽东女儿李讷）等三人贴出题为《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不久后李讷即被任命为解放军报副总编。

8月23日，江西抚州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

8月26日，广东海丰县发生残杀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的亲属及其他干部群众的事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等人攻击彭湃和他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是“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秘密调动人员进城，对反对他的人进行镇压和屠杀。有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400多人被打成重伤和残废，3000多人被打伤。彭湃的亲属中，其侄子彭科的头被挂在闹市区示众3天；其堂弟被枪杀，小儿子彭洪被投入监狱，折磨致死，8年后才通知家属；连彭湃96岁高龄的母亲也被秘密监禁，迫害致死。（1979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经过调查，惩办了这一事件的制造者和杀人凶手，为彭湃的亲属和其他人平反昭雪。）

8月26日，浙江“省联总”武装进攻萧山，制造了大规模的武斗事件。26日凌晨，“省联总”所属数十个单位的4000名经过军训的群众，在军队支左干部和“省联总”负责人指挥下，分3路武装进攻萧山，打死90多人，伤者众多。他们冲进公安局查抄档案，砸开监狱，带走5名在押犯，抢走监狱枪支和财物，不少机关商店也被抢。据10多个单位统计，被窃粮票5万多斤，损失10万元。农机厂被枪弹射中起火损失达24万多元。

8月28日，宁夏青铜峡发生部队开枪杀死造反群众的流血事件。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夺权斗争中分化出两派群众组织。他们都自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说对方是反革命组织。两派势不两立，多次发生武斗。8月16日，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就宁夏问题表态，支持其中的一派，认为他们是“左派”。他还要求驻宁夏的解放军部队坚决支持这一派，并公开讲：“必要时可以发枪自卫”。对另一派，康生斥责他们为保守派，应该解散。康生的讲话引起被称为保守派的一方极大愤怒，他们开着宣传车上街游行，呼喊反对康生的口号，并组织人冲击了宁夏驻军机关。8月28日，康生说“保守派”要搞“反革命政变”，“性质变了”，下令调动宁夏驻军进行武装镇压。当场打死101人，打伤133人。（1979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同意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为宁夏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冤案平反的请示报告》，对此案予以平反昭雪。）

8月30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第二年1月，又对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

8月31日，湖南发生大批武器弹药被抢事件。从7月底到8月底，湖南省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大批武器弹药被抢，共计被抢走各种枪支818支，“六〇”、“八二”迫击炮27门，手榴弹1万多枚，子弹250万发。

◇ 一九六八年

8月2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在省革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报告》。李瑞山在报告中说：从4月初以来，一些地区有人不断挑起武斗，制造了一系列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11月以来，全省银行、营业所被抢60余次，被抢现金734万多元。抢走和分掉国家仓库粮食44万斤，粮票63万斤。二、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房屋。三原县武斗烧毁松香90多万斤，损失达1000万元，烧毁棉花4000多担；安康两派在武斗过程中，烧掉已包装好的出口茶叶30万斤，炸毁供全城居民吃水的自来水塔，毁坏老城民房

1. 5万余间。三、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并私设电台。5月26日，一小撮坏人制造了西安铁路系统全线停车事件，6月3日又发生冲击西站事件，给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积压车皮高达8、9千辆；铁路、公路经常发生开枪、拦截车辆、殴打司机和值勤战士事件。全省有4个专区电话、电报不通，根本断绝联系的有29个县，邮件传递、电讯时断时通的有18个县。四、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被抢各类枪支数万件以上，子弹数百万发。6月2日，勉县部份造反派武装袭击国家绝密档案库，将守库的一个班的14名战士杀死9名，杀伤4名。五、拒不执行中央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7月31日，汉中两派发生武斗，打死21人，打伤38人。7月19日，西安数千群众攻打白家口地区，动用了航空机关枪、土坦克等武器，打死21人。此外，在全省一些地区，还不断发生武装攻打革命委员会、杀害革命委员会成员事件。

8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转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十二军党委〈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的通知》。《通知》说：“安徽芜湖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疯狂反扑和绝望挣扎，挑动一部份群众，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革命委员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和十二军党委遵照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认真分析了形势，采取了有力措施，特别是他们抓住了‘七三’布告作为强大武器，在全省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七三’布告、声讨芜湖地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攻势，团结、教育和保护了广大革命群众，彻底揭露和孤立了阶级敌人，迅速稳定了该地区的革命形势。安徽的经验进一步表明，‘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它是推动各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前迅猛发展的有力武器，对全国各地都有普遍指导意义。”

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两周年》。社论说：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教训，就是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往往是要通过隐藏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活动来实现的。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根本的问题。社论指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此后，全国普遍开展了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的运动。

8月8日，广西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自7月中旬后，“联指”等组织开始包围、攻打“四二二”占据的南宁市解放路和展览馆等地，武斗于8月8日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1470人，抓获俘虏9845人。被俘的人员被作为“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团”等交各县拉回去处理的有7012人，其中又有2324人被打死，被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有246人。据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20多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公社，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6000万元以上。8月12日，南宁市革委会与南宁警备司令部在展览馆举行“反革命罪行展”，共分3个馆，其中第3馆是“活人展馆”，将攻打解放路时抓获的26人作为“战犯”、“叛徒”、“特务”、“走资派”，挂上黑牌，关进铁笼子展览。近50万人前往参观。

8月10日，广西河池军分区召开会议研究武力解决风山县“七二九”（即广西“四二二”风山县“七二九革命造反大军”）问题。会议决定调集附近9县及3个兵工厂的“联指”武装力量，会同部队和风山人武部中队进驻风山，收缴武器。会后，即对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员全部包围清剿，共抓捕了1万多人（占全县当时总人口的1/10）。在围剿中，全县枪杀打死1016人，占“文革”中被杀死和迫害死总人数1331人的70%强。被杀害的人员

中，有国家干部、工人 2 4 6 人，参加过红军的 2 0 人，参加过赤卫队的 1 2 人，参加过游击队的 1 1 7 人。全县 8 6 个大队，有 8 1 个大队被“联指”枪杀了人。经过武装围歼后，凤山县革命委员会于 8 月 2 5 宣告成立。

8 月 1 3 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7 日社论《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并加发“编者的话”，指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抱什么态度，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个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要不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8 月 1 3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县发生大规模武斗，死伤多人，县城东方红剧场被火烧为一片灰烬。据不完全统计，在 6 月至 9 月宁夏各地发生的一系列武斗中，被打死的群众有 2 5 0 人。

8 月 2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通知》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按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从此，“工宣队”开始陆续开进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

8 月 2 5 日，《红旗》杂志第二期刊登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公布了两段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的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 一九六九年

8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所向无敌——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 4 2 周年》。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在中共“九大”期间的讲话指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要过细地做工作。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社论说：“‘三支’‘两军’，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我军最重要的群众工作。”“这是最好的建军，最好的备战。”社论要求“各级党委要认真总结‘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准备敌人打，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8 月 4 日，《人民日报》发表《政权建设中的一个新问题》。文章介绍 8 3 4 1 部队驻南口机车车辆厂宣传队“支左人员如何正确处理同新的领导班子的关系”。

8 月 1 3 日，外交部向苏联大使馆提出照会，强烈抗议苏联军队侵入中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流血事件。照会说：8 月 1 3 日上午，苏联军队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和武装部队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目前苏联正在调集大量军队和坦克，企图挑起更大的武装冲突。照会要求苏联政府立即撤除全部入侵的军队，立即停止射击。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8 月 1 9 日，外交部向苏联大使馆提出照会，强烈抗议苏军 6、7 两月在中苏边境蓄意制造挑

衅行为。照会说：从6月1日起至7月31日，苏联政府制造的边境挑衅事件竟达429起之多，严重的有：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构筑工事、修筑了望台，架设军用电话线路，向中国边防人员开枪射击；7月31日出动直升飞机、军用车辆和近百名军人侵入中国新疆托里县禾角克地区，向中国边防人员开枪射击；在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地区、饶河县七里沁地区、呼玛县吴八老岛地区，用轻重机枪、重炮向我边防人员射击。苏联各种军用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达40架次之多，还不断出动炮艇，向正常航行的中国民用船只进行种种挑衅。照会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一切入侵挑衅行动，立即全部撤除非法修建的设施和工事，不再阻扰中国船只在中苏国境河流的正常航行。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8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发布。毛泽东批示：照办。《命令》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指战员：一、高度树立敌情观念，充份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二、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三、军队指战员必须严守岗位，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外出串联。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实行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另立山头、重拉队伍的，要强令解散。五、坚决停止武斗，解散武斗队，上交武器。凡负隅顽抗者，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六、绝对不知冲击军队，抢夺武器，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七、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八、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职工、农民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进行生产。九、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度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 一九七〇年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这次会议是中共在庐山举行的发生重大影响的三次会议之一，也被简称为“庐山会议”。在会上，林彪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与毛泽东的裂痕公开化，并导致陈伯达被首先打倒。

8月29日，宁夏银川市革委会宣判“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案”。“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是由13名66、67届大学和中学毕业生于1969年11月在银川成立的自修组织。其中有3名当时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中年纪最大的26岁，最小的21岁。“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守则”中写道：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踏实地而不是虚浮地、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有政治远见，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探索并了解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誓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的革命战士。”“守则”还说，“自修大学”是以“刊物为中心，通过自修与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这个组织成立以后，自筹经费印过两期“学刊”，刊登了“社论”等六篇文章和三篇农村调查报告。1970年3月，在当时进行的“打击反革命”运动中，这个组织被当局定为“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进行旨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反革命组织”，“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有言论、有行动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十足的帝修反的别动队”。他们的罪证，就是他们在两期“学刊”上印出的文章和他们的来往书信。这13名青年中的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3人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通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徐兆平被判处15年徒刑；张维志被判处8年徒刑；张绍臣被判处3年徒刑；其余6人受到拘捕关押和在本单位被隔离关押和“批判”“斗争”。其中22岁的女青年熊曼宜被逼自杀。（1978年8月8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召开大会，为这一冤案平反。1978年9月29日《人民日报》也报导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错案中受到迫害的青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题为《革命青年的锐气是扼杀不了的》。）

◇ 一九七一年

8月7日，毛泽东在会见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时，谈到“文化大革命”说：有一段时间，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你们大使馆还算好的，没有烧掉，英国代办处烧了。那时候也是无政府主义。我们烧大使馆那两个月，都是极左派当权，自己向国外发电报，都是极左啊！极左思潮有些不是“五一六”，要进行教育。文化大革命的一部份成果就是把这些坏人暴露出来了。同日，周恩来在会见奈温时也说：“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你们新大使来后可能知道一些。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学生佩带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甸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一个是要冲缅甸驻华使馆，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两件事都有坏人，他们想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另外，那时我们驻外使馆也出现过一种情况，就是对重大政治问题直接对外发照会。”“在1967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份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8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发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提出了教育战线那最著名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教师队伍中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说不通的。“《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报告，宣布撤销以中发〔1971〕44号文件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巡视南方各地并同沿途各地负责人作重要讲话。这就是著名的“九·一三事件”爆发前的毛泽东南巡。这次南巡，是毛泽东为清洗林彪而作的一次重要的准备工作，也因此促使了林彪出逃事件的发生。

8月25日至9月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陕西省委汇报会。周恩来对会议说：“毛主席在延安，陕北人民丰衣足食。现在全国已经解放20多年了，听说陕北的群众粮食还不够吃，我们感到很难过，革命圣地没有搞好，对不起老区人民。”会议形成的《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指出：陕西在经济上的主要问题是，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比较慢，与兄弟省、市、区相比落后了。主要的原因，一是阶级敌人利用资产阶级派性煽动无政府主义，制造停工停产。二是少数人闹派性成瘾，制造分裂、争权夺利。三是有些人纪律松懈、规章制度废弛等。

◇ 一九七二年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8月3日的来信作出批语说：“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邓小平的这封信是由江青转交给毛泽东的。在信中，邓向毛泽东表示永不翻案（全文见本刊zk0012a），这也是后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来历。8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批语，同时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活动。

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通知》后还附有《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共“九大”后，全国各地普遍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各级党委相继重新建立。为适应这一变化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这一《通知》。《决定（草案）》说：要加强党的领导，在一个地区，要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以后，军管即可撤销。”该文件发出后，自1967年1月派出的军队三支两军人员，开始陆续撤回部队。

◇ 一九七三年

8月5日，毛泽东与江青谈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毛指着郭沫若著的《十批判书》说：我这是批判用的。毛还给江念了自己写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还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8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不要马上公布，“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

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先声。该文共分两个部份：一、孔子的政治立场；二、孔子的思想——“仁”。文章认为：从孔子对四件事的态度：反对鲁国“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反对田成子取代齐简公；反对铸刑鼎；杀少正卯，说明“孔子顽固地站在日趋崩溃的奴隶制一边，坚决反对新兴的封建制改革”。孔子“仁”的思想，“是为正在崩溃中的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就是“剥削有理，造反有罪”。8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杨荣国的另一篇文章《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杨荣国早在1943年便发表了《孔墨的思想》一书，是一贯反孔的学者。“文革”后，杨荣国被当作“四人帮”的爪牙批判，1978年去世。）

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7月19日的报导《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发表了张铁生写在考卷上的自白（见本刊zk0101d），向全国推出了张铁生作为“反潮流”英雄。《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省。”《辽宁日报》的《编者按》也说：“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张铁生“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份。第一部份说：根据已经调查核实的物证、人证，现已查明：一、“早在九大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二、“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发动的突然袭击，是有预谋的。”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党集团立即秘密进行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林彪还企图勾结苏修，对我实行南北夹击。”四、“林彪叛党叛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林彪出身于大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入党以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报告的第二部份说：“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是国内外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林彪反党集团作为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代表，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

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报告的第三部份说，“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二、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三、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四、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五、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会议确立了王洪文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 一九七四年

8月1日，《红旗》杂志刊登署名“罗思鼎”的文章：《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文章说：“在赵高一手策划反革命政变时，唯一有可能起来揭露和抵制的李斯。却表现了不可原谅的妥协和动摇。……李斯为了保全自己‘富贵极矣’的地位，一开始就摇摆不定，妥协退让，以至容忍了赵高的阴谋得逞。”这是“评法批儒”期间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文中的李斯被人们认为是影射周恩来。

◇ 一九七五年

8月13日，毛泽东在和北京大学古典文学女教员芦荻谈到该如何评价《水浒》这本书时，说道：“《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8月14日，当时负责主管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在得到毛的这份谈话记录后，不到3个小时，即给毛写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份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还说，“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需要看，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评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反修防修，是有积极意义的。”毛提笔批示同意了姚的信。由此，中国大陆开始了“评《水浒》”的运动。

8月13日，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校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4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有问题，说：“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纪律，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并随信附了《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材料》共列举了迟群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家长式的恶劣作风，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以及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五个方面的问题。10月7日，刘冰、惠宪钧、柳一安3人再次联名给毛泽东写信，继续揭发迟群和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谢静宜有问题，并随信又附上了《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的报告。这两封信都由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

10月下旬，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作出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以此为起点，中国大陆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8月13日，四川雅安的一名年轻人李天德投寄《献国策》的政论文。文章共分12条：1、节制生育，控制人口；2、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3、为农业人口提供福利；4、教育革命问题；5、知青下放问题；6、医疗卫生问题；7、干部问题；8、纠正歪风邪气；9、刑法、定罪、治安问题；10、重新认识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等问题；11、领导的任期与功过问题；12、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讨论。李天德在“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中说道：“关于文化大革命，坏处大大超过好处，（A）我们的许多好干部受到林彪一类的迫害；（B）我们的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愚弄，受了坏人的唆使，象仇人一般互相厮杀；（C）让林彪一类大小坏蛋捞了便宜。小坏蛋搞打、砸、抢、抄、抓、奸淫；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搞法西斯主义。为一切仇杀、个人报复大开绿灯；（D）国民经济遭到建国以来仅次于‘自然灾害’年的空前破坏。中央当然不可能知道文革期间全国工农业产值的真实数目；（E）在精神道德方面，由于林彪搞的神秘主义、宗教迷信、极权崇拜，使人们变的不诚实、伪善、奸猾。”李天德在上访人员接待站被捕，不久即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79年，李天德被改判无罪释放。《献国策》一文的原件，现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收藏。）

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还先行发表了1975年第9期《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

## 【往事追忆】

### 红卫兵小报和我（十九）

• 周孜仁 •

（续上期）

自从二月底我离开报社，《815战报》就一直由何国光、周兴福、李文全等几个电机系和动力系的高年级的同学操办。北京回来，无所事事，好像已被疏离于主流群体之外，我终日晃荡。六月七日，晚饭后，正在无聊，王太康、蒋元伟二人突然兴冲冲闯进门来，大声问我：敢不敢去打砸派？

王太康即815事件第二天和我一起到北京告状的那位亡命之徒。而蒋之亡命程度又远在王之上，保守派甚嚣尘上的1966年秋，他曾独自闯入数十人的包围圈，爬上几十米的高烟囱顶将“麻子兵”的大喇叭强行撤下，英雄独胆，让保守派惊骇唏嘘！整个文革期间，蒋好像都未明确呆在某一战斗组织，总是四处奔走，如绿林之游侠，在最精彩的地方，总能遇到他在其中张扬。毕业后亦如是。九十年代末，他从贵阳电厂总经济师位上归隐，才一直与麻将为伍。蒋、王二人当年都是舞蹈队队员，身手矫健。在他们眼中，我当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秀才了。我正年轻气盛，自然不愿怯场，遂答：有什么不敢？走就走！

于是，他们递一根金属棒给我，接着一起爬上卡车，开到三教学楼停下。三教学楼是采矿系办公大楼，该系同学下矿实习时都由学校配备劳保用品，藤帽极多，大家进去一人取一顶戴上，就出发了。车开进距重大不远的重庆师专，暮色迷茫的操场上已经停满卡车，足有好几十

辆。车兜里挤满武斗人员，手中全都举着棍棍棒棒，多无顶戴护卫，装备不如我们精良。满场气氛鼎沸，全不像是去冒死拼杀，而像是去观看世界杯足球大赛一样兴奋。不一会下雨了，雨滴绵密如丝，飒飒啦啦一片。这时蒋、王二人不知到哪里去了又从哪里回来了，急冲冲地把我拉下卡车又带我钻进了一辆莫名其妙的大客车，要我躲雨，上去了，我才知道是指挥车。熊代富，就是后来的重庆市革委的副主任，正和一帮人紧张紧张商量作战方略。他是这此行动的总指挥。

天慢慢黑净，雨越下越大，卡车开始编队出发。雨太大，路滑，车启不动，就命令大家全都下去推车轮。马达轰隆隆嘶吼。推车人满身泥水，惊咋咋呐喊。光柱里，雨丝如麻，人车乱成一片：让人很容易想起历史巨片中大战将临的镜头。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和我们将要干什么去。

这就是：去北碚，亲历重庆文革史上著名的“六·五血案”。

届时为止，这确实是双方有预谋、有组织、大范围、调动了大量人力、器械、运输工具的最大一次武斗，一时间成了两派舆论渲染最多的事件。6月16日出版的《815战报》26期，几乎用了全部版面报导此事，文章计有：“一腔热血怒澎湃，洒去犹能化碧涛——记西师六五大血案”、“西师831炮制六五大血案铁证如山”、“杀害解放军的凶手，往哪里逃！”、“何其残忍！何其狠毒！”、“勇献青春谱壮曲，笑洒热血写春秋”、“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历史”。文章有铺垫、有高潮、有细节，而且每个细节都惊心动魄，通读文章，宛如重读战争年代的悲壮故事。比如，写到“八三一”将“春雷”围困三楼，然后准备实施爆炸一节，文章道：“暴徒们点燃两枚雷管的引线。引线在迅速地燃烧。大楼在危急之中！二百多名阶级兄弟的生命就要毁于一旦！/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高大的身躯冲上二楼，猛地扑向炸点。‘轰——’雷管爆炸了！这个身穿绿军装、背着水壶的解放军战士应声倒在血泊之中……大楼没有炸毁。……他的共产主义英雄形像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关于事件的准备，《815战报》则刊登了若干八三一战士的揭露材料，其中有刘XX说：“六月五日中午，我大队勤务员说下午有个统一行动。下午约两点半，同学通知我到美术系办公室，并叫带上棍棒……约三点到了总部，周学昌（勤务员）说今天下午攻新图书馆，把春雷赶出来……约四点，广播里吹起了冲锋号。见很多831战士手持棍棒冲进图书馆大楼。总部门前的宣传车（北碚反复辟指挥部，是井冈山）高叫：‘春麻挑起武斗’……周荣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武化大革命。四川最后是枪杆子解决问题，最后逼你拿起枪杆子了。’”还有张XX说：“5日午饭后，总部通知中文系大队的全体战士把基建科的铁器搬办公大楼上，搬完后回到宿舍。这时是两点半左右，班勤务员个别通知说，等会儿广播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开始行动，反穿衣为号。”这些材料估计是后来被俘的西师八三一人员在提审时的供词。以上资料，有一些，现在可以依据逻辑判断进行证实或者证伪，有些却不能。但是，正如控制局势的815想稳定大局，以求一统天下一样，处于劣势的砸派要寻找重新分配权力的机会，必然要搅乱政局、打破均衡，这当是毫无疑问。几十年后，把那些偏颇的、过于离奇的成份剔除，重新叙述这段历史，我以为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先是，西师八三一总部设在中文系大楼。离它不远的山头上，图书馆大楼新建垂成，算是个制高点了。勤务员周荣事前曾主张占领那幢楼，尚未动作，却被春雷抢了先手。春雷占据大楼之后，立即着手修建工事，据称，其间还有若干外单位的同派工人、学生参与抬石扛木之举。工事既成，装于楼顶的高音广播便开始日日刺激八三一的已十分敏感的派别神经，按八三一的說法，算是“挑衅”了。据说八三一人到食堂吃饭路过，也有被春雷掷石子击中者。于是周荣便有了充足理由，向勤务组坚决提出：把楼抢过来！这样，经过一番策划，八三一在西农826、川外826、十三中“九八”、河运“航峰”、重庆医学院等数百人支持下，于六月五日下午向大楼发起了突然袭击。



这是一座刚刚断水的建筑物，由阅览楼（主楼）和藏书楼（副楼）两部份组成。主楼高四层，副楼高六层，主楼二楼有天桥和副楼相通。八三一从主楼底层和藏书楼同时攻入，将春雷完全困到主楼的三层以上，既后便将二三楼之间的楼梯用炸药炸断，既后又用火烟炙烧熏烤，火中还加上些辣椒、六六粉之类辛辣刺鼻之物以加强熏烤效果，显然是想将春困死楼顶。事前，春雷已有所准备，用汽油铁皮桶装了好些凉水，还准备了饼干之类的乾粮若干。听说前来劝架的解放军还用吊篮送去了一些食物，这样，春雷得以艰难困苦下坚持下来了。被困第三天，即六月七日晚，八一五经过精心策划，几十辆满载武斗人员的卡车于是在莽莽夜色飒飒风雨中出发了。

从沙坪坝开车到北碚，正常情况下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可那天晚上我们的车却走了整整一个通宵。天黑如墨，行动又力图隐秘，车速就极慢。更严重的是，途中不断遭遇袭击，行车就更谨慎了。开始是在双碑，正行进间，车龙突然停了下来，估计前面遇障碍了。一辆吉普车在密密雨丝中逆向而来，车轮吱吱作响，车上人一路用手电筒直射天空——这是约定的信号——我们立即用手电光回应。指挥车位居车队中间。吉普车在我们面前急停，侦察兵随即跳出车报告，气喘嘘嘘说前面山谷已被砸派用石条封锁，且两边山头疑有伏兵，车队不敢前进了。总指挥熊立即开会商议并作出决定：令后面的人全部下车，徒步前去包抄山头，打掉伏兵，占领隘口后抬开石条，然后齐喊杀声冲杀而过。等位居后面的空车开到，抢夺隘口的人员再行上车跟进。

战斗进行得比较顺利。不久便得侦察兵报告，说山头已经攻占，隘口已经疏通，指挥车于是下令所有车辆全速前进。那一刹那，我记得非常清楚，恐怖万端的“杀”声在旷野里呼啸而起，真的个撕心裂肺，震天慑地。所有汽车顷刻之间提至全速，疯牛狂奔，猛冲而前。闪过隘口那一刻，瞳孔急剧放大，我看见两边站满手握棍棒的人，乱石已被扔向路边。有那么一刹那，山上好像有一根木头滚下，还有一个人跟着滚下来，没及站稳，被我派人员发现，冲过去，一棒将其打翻在地。

出了峡谷，几乎凭借一种惯性，车队继续狂野奔突。周遭黑不见指，我们如坠虚空，如临地狱，直向一片未知空间坠落。突然间，惊天动地的破碎声砰然炸响，让人顿然觉醒，很快发现客车两面的窗户被砸得粉碎，碎玻四溅，石飞如矢，我们车厢里已有人被砸得尖声怪叫，头部血流如注。前后的车队中也叫声一片——知道中了伏击，于是急令停车等待，并派人下去向道路两边的田野搜寻追击。俄顷，平静无事了，车队又缓缓启行。雨脚已住，野地里云路俱黑，什么都看不见，害怕再遭伏击，车队只敢边停边走，缓慢而行。时近凌晨，好容易快挨到北碚了，突然又得报告，说前面隧洞里闪烁有光，疑是伏兵，车队只好又停下来，又派人包抄山头，打通隧洞。当时已时近五更，年轻人都已困顿难支，昏昏欲睡，不知又过了几时几分，等到把山头占领，曙色已依稀放明。驱车行过，隧洞里原来是红农八一五点着火把在那儿接应：算是闹了一场误会。次第到达北碚，天已大亮，大战将临，大家顿时倦意全无。当地妇女老太箪食壶浆，送来稀饭、咸菜、点心和鸡蛋等物，我们一点都吃不下，急急开车奔现场去了。

现场场景让我大吃了一惊，以至几十年后我叙述这一节，还能记忆得清清楚楚。这完全是一幅典型的原始部落的械斗图画：废墟般的楼顶站满了人，都光着身子，或者穿着破烂不堪的背心。脸、手均被熏得漆黑，头上扎着棉花（大约没有头盔，故撕开被子以棉代之），白色。每人均手持棍棒，活脱脱一群头顶插满羽毛的印第安土人木立蛮山荒岭。楼间尚有火烟缭绕，其味刺鼻。山城六月，很热了，飘绕的火烟让人更觉酷热难耐。此情此景，让我心中不觉大骇。

大队人马的突然出现让八三一猝不及防。八一五还暂不知如何动手。双方于是对峙。很沉寂，如暴风雨前的宁静。我们的指挥现场设在楼旁不远的几株树下。四周作了布防。地上摊开一张示意图。熊等就蹲成一圈商量攻略。接着召来许多建筑工人，又运来木料若干。很快钉成

云梯几把。接着，指挥人员用最古老的办法：射箭，与四楼的春雷交换了信息，攻略便布置完成了。一会儿，春雷从四楼扔下几根长绳，攻方拉过绳头将云梯捆好，冲锋号就凄厉响起：总攻开始了！云梯很快被拉上三楼，顷刻之间，武斗人员便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大楼涌扑而上，由云梯攀爬而上，多数是中学生，什么装备都没有，光着头，全不顾矢石如雨。很快，有人被砸，被伤，被坠，血流横飞，喊声震天，但无人畏缩，一个个只是奋勇争先，前赴后继。飞石是从二楼倾泻而下的，如瀑，如雨，飒啦啦掷地有声。三、四楼的春雷为掩护冲锋和登楼者，便奋力向二楼洒石灰，扔石头。云梯上偶有伤者坠落，但更多人已冒死上楼，爬进窗口接应疲惫不堪的“春雷”。

我站立旁边呆看了一会儿，便禁不住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急，并且急不可耐。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拼命，所有人都在生和死的边沿厮杀，我不想成了局外人。于是提起棍棒，我冲锋向前。杀声和石雨在我头顶呼啸那一阵子，我什么也没想过，我不想证明什么，也不想取得什么，所有动作完全都是情绪使然。人是很渺小的，如潺潺小溪。也许命运会让你在阳光下蒸发，变成云，到天空里自由翱翔，变成风，去吹动船帆和磨房的风翼，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会被大河急流所裹挟而身不由己，前面即使是万丈深渊，你也只能跌落而下，这是你无法选择的。你为世界炫示了一幅壮丽的飞瀑图，而你自己，却被砸得粉身碎骨。——就这样，我冲上去了，冒着如雨矢石，在重庆第一场最大的血与火的撕斗中。我不愿意胆怯，我就想和谁拼命。

主楼一楼的几个方面已快突破，唯正面大门堆满石条，又有厚厚的黑板阻挡，攻击人员甚显薄弱，我就向那儿冲过去。先是，双方通过大门上方的天窗互扔石头，外面人多石头多，火力凶猛，很快把敌方压倒了，于是人员就冲上去搬石条，用棍棒砸黑板。里面的敌人大约已无东西好扔，于是突然扔出许多点心和茶叶鸡蛋之类，攻方多为中学生和农民，一见掷物中有如此美味，马上停下进攻俯首拣拾，一边拣一边揣物入囊。眼见得胜利在望而这般人如此眼浅，我怒气中涌，跳出头疾首大呼：不要拣！不要拣！话音未落，里面已经一阵乱石抛出，当场砸得贪小利者惊鸣呐喊，这才不敢懈怠了。我于是成为领袖人物，我大声呐喊，指挥大家扔石还击，同时命令大家把堆积如山的石头抬开，同时喊叫着砸黑板。黑板很厚，结实，砸了很久才砸开。破门了，跨越而入，冲进大厅，其他几方大门早已洞开，八一五呼啸涌进，八三一惶惶作鸟兽溃散。

冲上二楼，已全是我方人员了。二、三之间的楼梯已经炸断，众人一边搭木板把“春雷”接下来，一边又顺天桥向藏书楼冲击。藏书楼空间狭小，窄窄楼道更被胜利者挤得水泄不通。事实上，“大八三一”们早就跑掉了，有没有跑掉的，人数已经极少。寡不敌众，且战且退，一层楼一层楼地向上溃去。八一五人多势众，从楼梯通道用急雨狂飙般的石块开道，呼啦啦尾追而上，还有一些人就用棍棒冲打楼顶的铁皮——书架是混凝土整体浇灌的，为了通风，在书架处预留了一排排空档，其上叠放着一层层可以上下挪动的放置书籍的铁皮隔板。隔板捅开，其余人就通过空档向上猛抛石块。八三一已兵败如山倒，很快退到六楼：无处可退了。我们到达了制高点，如苏联电影之攻克柏林，红旗应当插上国会大厦了。只是空间太窄，也没有红旗好舞动，面前就一大群惊恐万状的战败者，我方于是得意洋洋高呼：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造反派们平时都很非常慷慨激昂，动不动就喜欢“誓死”这样“誓死”那样的，可一旦面对真刀真枪的敌人，举手还是举得很痛快的，而且一个举得比一个快。也有举得稍晚一点的，胜利一方正好就有了表现自己英勇无比的机会，于是便毫不客气地一棒打去，打着哪儿是哪儿：头部、肩部、胸部、臀部……只要打得出血打得叫唤，哪儿都成。可惜满屋子很快就连举得慢的人都没有了，只好就砸碗、砸水瓶、砸洗脸用具什么的，好像器皿也属砸派观点，都该挨砸。

现在我承认，我也是这帮冲上六楼的胜利者之一。我也用棍棒砸过碗、砸过水瓶、砸过洗脸用具，直到把它们砸得粉身碎骨、七翘八拱——而且，我也抡起棍棒打过举手迟缓的“敌人”。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如此完全投入地打了人，我已记不起我打了谁？打到他什么位置？把他打疼打伤没有？总之我是打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头脑一片空白。盲目而疯狂的情绪彻彻底底主宰了整个全身。我已经不属于思想而属于恶魔般的激情。这大概就是小说书所说的“杀红了眼”吧？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我手上有一柄钢刀，我完全可能和对方来一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几十年后，每想到那场景，我都如恶梦般地困惑：那个冲上别人的图书楼抡起乱棒砸东西打人的家伙，是我吗？他怎么会那样呢？读者们还会在下面的文字里读到重庆武斗许许多多鲜血淋漓的故事。我在重新记述它们的时候，有时还不由自主感到恐怖而全身颤栗，我不敢相信这些只可能发生在历史小说或地狱里的故事曾经发生重庆的阳光下，发生自己身旁，发生在同学、朋友和亲人中间！他们都是那么可亲可爱，在若干公众场所甚至还十分腼腆。他们怎么会突然间变成如此残忍的杀人者，或者无辜地被杀？这种困惑和痛感逼迫我把自己的文章写下去：为了让我们的孩子们永远只能在历史教科书上读到这些悲剧，而不会在现实中——面对计算机的荧屏，这时，我必须认真地清理清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是什么样的力量，把人，那么迅速地异化成了野兽？

下面继续 1967 年 6 月 5 日发生在西师的故事。

俘虏全部押下楼，一清点，多是北碚地区的中学崽儿。事后，“八三一”的宣传材料说有三百壮士遇难。我以为这个数字太夸张。因为藏书楼一层空间就那么大，根本容不下如此众多好汉。“战斗”结束，我曾溜哒到大楼旁边收容俘虏的平房去看过，俘虏全蹲在地上，由带队者领颂毛语录。还发了点心，并通知家长逐个领走。大学生就十来个，全押回重大了。

事发第二天，重庆街头就出现惊人消息，说西师八三一在“六五血案”中有“三百壮士”跳楼，其惨烈悲壮丝毫不让于抗日战争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这一消息再次把我打懵了。我承认，在我过去所写文章里，叙事不实者有之、夸张骇听者有之，究其原因，最多不过道听途说、派性偏见而已。在亲历了惨烈血火的切肤之痛，发现舆论与真实竟如此天差地别，这确是第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打那一刻开始，我觉得自己的胆儿也突然间忒大了，我也让哥儿们马上写出八一五的悲壮故事：在施家梁遭劫中，八一五有“八百壮士投江！”。从此以后乃至很久，甚至大学毕业后到了遥远边疆，在全民“庆九大、献忠心”，即庆祝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向毛敬献忠心的活动中，写通讯稿、写学毛著积极分子“讲用材料”，我都一直沿袭红卫兵遗风，胆大妄为、随心所欲、信笔由缰，爱怎么写怎么写，极大提高了当地宣传部门的发稿率和好稿率，深得领导赏识。当政治理想和支撑它的革命理论还是一种信仰的时候，人们的所有行为，不管崇高、愚蠢甚至荒唐，却必然都是真诚的。而一旦发现政治仅仅是一种功利，人们就会把支撑它的理论当作一种武器了，就和商人手头的金钱一样。为了实际功利，原本十分神圣的理论简直就成为婊子，爱怎么耍弄怎么耍弄，可以搞权谋、可以夸大其词，可以欺骗，可以造谣，可以假冒伪劣，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